

“中国和互联网：技术、经济及社会转型”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胡献红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2003年5月30日—31日,首届“中国和互联网:技术、经济及社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举行,这是首次以中国互联网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位学者、政策分析家、产业界领袖、新闻界和法律界人士参加了会议。此次学术盛会的主办单位包括南加州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纽约卡都索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伦敦斯坦侯普传播政策研究中心。会议协办单位有美国Lohan媒介公司、马可基金会、兰德公司,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学术及商业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代表着最新一次信息革命的互联网技术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国互联网自那时起一直持续、高速地发展,即使当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发展渐趋停滞时,中国的互联网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网民数已经增加到6800万人。中国互联网独特的发展模式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成为世界互联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次国际学术会议探讨的焦点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在不利的条件下仍能保持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何种影响?政府、企业、用户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迈入信息社会?

大会第一天,南加州大学安农伯格传播学院院长Geoffrey Cowan向大会致欢迎辞,并对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Monroe Price、余家民、和邱林川表示感谢。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Orville Schell在主题发言中指出:由于传统和现代性的双重影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两面性;政府既大力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同时对互联网采取严格的管理。由于互联网是一种较难进行外部控制的新技术,中国的互联网规范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并将为那些寻求遏制恐怖主义活动的政府和治理网络侵权行为的公司提供借鉴。

会议播放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教授的发言录像。龚院长首先描述了中国目前的互联网发展状况。中国共有2080万台计算机联网,79%的政府部门

[收稿日期] 2003-06-20

[作者简介] 胡献红,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设有信息化办公室来促进效率和透明度;中国网民花费大量时间上网看新闻,提供新闻和其他服务的中国门户网站在国内享有很高的认可度。中国网民数量增长很快,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总人口的 4.6%,还有宽广的发展空间。龚院长认为,中国的网络文化倡导多元化,并由此孕育了新一代,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网络语言;龚院长还指出,由于手机短信在 SARS 危机中发挥的传播威力,它已经跻身于传统的媒体行列,成为一个新兴的、正当有效的传播媒介。

本次研讨会为分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互联网政策、互联网规范、赛伯空间的公民权利、电子商务和手机商务、电子政务、虚拟社区、网络媒体、政治传播九个专题进行研讨,此外还有一个就“中国的 SARS、手机短信和互联网”进行的特别专题讨论。下面概述各个专题组的主要观点。

专题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郭良向会议做了题为《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的发言,首次发布了 2003 年度对中国 12 个城市、总计 4000 样本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这 12 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西安、沈阳和五个县级市,其中 5 个县级市分别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个案研究。该研究的问卷调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起的世界互联网项目在中国大陆的合作项目,着眼于研究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基于最新采集的数据,郭良得出的初步研究结论是:传统媒体关于互联网的负面报道影响了人们对互联网的态度,人们仍然信任传统媒体,县城居民更倾向于信任国内媒体而不是外国信源;互联网增加了人们家庭以外的人际交往,多数人认为互联网会促进政府更加开放。

中国社科院学者卜卫就中国互联网的性别鸿沟问题做了发言,该研究基于 2001 年《中国五城市互联网使用和影响》(郭良卜卫,2001)的调查数据,分别从网民的人口特征、使

用模式、用网偏好、上网需求、对互联网的态度以及开放度研究了性别差异,说明信息技术并不能自动地促进性别平等。

来自夏威夷大学的亚洲研究专家 Eric Harwit 教授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电信业和互联网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扩散,他向会议做了题为《电信业在中国不发达地区的扩散:电话、互联网和数字鸿沟》,哈维特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通信设施在近 20 年飞速增长,为世界范围内缩小数字鸿沟做出了榜样,但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十分严重,例如大城市的互联网接入是贫困农村地区的 100 倍。他认为,中国只有解决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才能取得电信业的整体发展。

专题二: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策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和信息学院副院长汪炳华(Peng Hwa Ang)博士分别从法律法规、技术手段、社会规范和市场四个方面研究中国规范互联网的手段并解释原因。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宏观上使用包括惩罚性措施在内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但法律的执行有所滞后。国际互联网接入的昂贵价格可以看做是另一个规范手段,中国最终也会使用社会规范的力量——中国人对西方技术的怀疑来作为一种规范手段。

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 Ann Shann - yue Cheung 专门研究了中国互联网法规中的内容规范。威斯康逊 - 麦迪逊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Youson Chung 通过分析中国前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以及现在的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调控机构的层面研究并预测了中国互联网规范的未来——那将是各个相关机构融合的局面。

卡都索法学院研究生 Brendan Murray 研究了中国网吧的治理整顿,认为整顿的目的更多地是着眼于社会安定。例如,2002 年的网吧关闭导火索是发生在北京的网吧火灾,而不是像西方普遍认为的是出于政治考虑。

专题三：一个新的长城 ——互联网规范

兰德亚太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James Mulvenon 研究了中国规范互联网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包括电子邮件的监控、pop 服务器的封锁、内容封锁技术、DNS 黑客技术等。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法学副教授 Assafa Endeshaw 指出,正像沙特阿拉伯、缅甸和伊朗等国家那样,中国在对待互联网方面也面临困境,一方面有赖于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增长,一方面担心其负面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规范互联网的过程中,中国只有同世界其他国家就互联网带来的共同问题(如儿童色情)达成共识才可能取得成功。

纽约 Fordham 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Sonya Katyal 说:“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只是受到美国启发,而绝非美国强迫的”。中国同美国签署了保护智慧产权的双边协议,但执行起来很滞后,特别是在音乐、电影和软件业方面;而对内容浏览方面的限制又太多了。瑞典 Lund 大学东亚语系中国研究博士生 Johan Lagerkvist 通过研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主导的互联网的态度,认为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全球化持悲观态度,他们相信中国文化必须摒弃来自“金钱崇拜、享乐主义和自我崇拜”的影响。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郭良认为中国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查不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严格,虽然一些包括英文网站在内的站点被过滤了,但从中国互联网入户调查的结果来看,直接阅读外文网站的网民只占很小的比例,而来自大陆以外的许多中文网站同样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BBS 的作用,网上 BBS 是交流场所,但由于中国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等新闻报道方面的缺席,BBS 在中文互联网上往往发挥了媒体作用,例如 9·11 事件;虽然 BBS 上的讨论是受到版主控制的,但讨论的内容和观点仍然多样化,而且网民和版主之间互相交流,大家自觉维护 BBS 的讨论秩序,因为保障 BBS 交流空间的存在

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如果因某人的过激言论而导致 BBS 封站,对其他网民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

专题四：赛伯空间的公民权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Taylor C. Boas 研究了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控制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哈佛法学院学生 Benjamin Edleman 与其同事收集并研究了中国在 2002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所采用的互联网过滤手段和封堵的网站内容情况。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的 Kathleen Hartford 教授从南京通过网络向会议进行了远程发言,她研究的问题是审查制度对网上舆论的塑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来自荷兰 Leiden 大学的 Lokman Tsui 探讨了中国的网络隐私问题。

专题五：电子商务和手机商务

中国在线(China Online)网站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Lyric Hughes 在主题发言中讲述了该网站的创办历史和新型商业模式。中国在线是一个提供中国商业信息的网站,创建于 1998 年 2 月,启动资金来自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 1500 万美元,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该网站已同中国 300 家报纸建立了联系,盈利模式多样,包括订阅收入、链接主页、提供中国的互动地图等等。在她看来,互联网只是一个传输介质,而不是商业本身;因此,她的未来计划是将业务从网上扩展到网下,建立一个商业新闻电视频道和报纸。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员 Simona Thomas 基于 2002 年对在华外企和中介组织就电子商务的访谈数据,得出结论:外企在中国电子商务领域十分活跃;中国的电信和网络基础设施不再是问题,因此中国现在应该重视发展手机商务(M-commerce);受访者对现有的法律框架表示满意,并不要求专门的电子商务法律;政府积极推动的 B2B 业务成为中国未来电子商务发展的决定因素,B2C 平台则更多地

向客户关系管理转变,后勤和支付问题仍然是中国推进电子商务的最大障碍。

BDA 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就中国的电信业、媒体业提高战略咨询和独立研究的公司,该公司主任经理 Duncan Clark 做了关于中国手机短信研究的报告。中国手机用户是 6000 万网民的三倍以上,中国沿海地区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 2002 年有 1000 亿条短信发出,主要都通过中国移动的网络,中国 30% 的手机用户频繁地使用手机短信,平均每月发出短信 37 条。Clark 从技术、经济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短信繁荣的原因,同时指出,手机短信在 SARS 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传播作用充分证明这是一个新兴的大众媒体。

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研究员 Jennifer Gibbs 的研究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电子商务调查,中国的电子商务在总体上仍然很落后,关键的问题是缺乏法律的保护,隐私和安全问题没有保障;当然,在线支付系统的缺乏也是一个问题;同其他国家采纳电子商务用于提高效率而言,中国的电子商务主要受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驱动,更多的用于客户和售后服务。

专题六:中国的电子政务

华盛顿大学传播系的 Tuen-yu Lau 博士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评估了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电子政务目前主要发挥提供信息的功能,尚未到达公民与政府互动的层面。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张俊华追溯了自 1985 年办公自动化开始到宣布 2002 年为电子政务年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指出中国电子政务平台是中心化的,目的是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和提高透明度。田纳西大学的 Sally McMillan 和周湘从事了一项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网站的内容分析,将现有网站分成两类:政府间(G2G)网站和政府与公民之间(G2C)的网站。她们的研究发现,就提供的在线服务而言,沿海发达城市的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量更大。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 Jens

Damm 研究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电子教育的中国网络政策,并对福建和广东的政府网站做了个案研究。

中国社科院学者郭良认为,与会学者所研究的电子政务局限在政府上网这一块,而对于中国电子政务来说,真正实质性的影响是政府内网,它在物理上同互联网隔离,但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而且提高了政府办公效率,广东南海的电子政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专题七:身份认同和虚拟社区

纽约城市大学博士生王庆宁研究了中国的网上同性恋社区及其面临的审查和管制问题。马萨诸塞大学硕士生唐对日本“X”视觉摇滚乐队的网上歌迷论坛进行个案研究,检验了其中的人际关系、个人认同和参与者的特征。爱荷华大学的博士生张伟东基于电子邮件所做的调查结果,以满族为例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网上社区,发现少数民族上网的重要原因是寻找信息、交友和获得归属感。

Randy Kluver 认为,反思 Rheingold 的网络社区乌托邦理论和 Barlow 的互联网必定导致更加民主的观点。会议上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成功的推动和应用了互联网,而这一切都在原有的信息管制框架之中进行的。

专题八:网络媒体

佛罗里达大学的博士生吴旭将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历程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和大一统这三个阶段相比照,分别研究了中国在这三个阶段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在政府引进互联网的第一阶段(1994-1997),更多地将互联网看做是教育工具和新技术,而不是大众媒介。在第二阶段(1997-2000),呈现出商业性网络服务商和内容服务商同国有供应商竞争的局面,政府在 2000 年颁布了第一个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适用所有媒体的媒介法规。在第三阶段,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所有

媒体的控制。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教授对香港和上海两地新闻记者使用国外和国内新闻网站来源的情况做了定量的分析,香港的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互联网并将其看做是信息来源;而由于中国当前的新闻业务和互联网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上海的新闻记者使用互联网的程度较低。陈教授以2002年9月14日南京发生的中毒事件的新闻报道为例,指出互联网有助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但由于互联网和媒体所受到的控制,这种潜力很难实现。

专题九:网络上的政治传播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和信息学院副教授 Randy Kluver 研究了中共十六大的宣传网站。他发现该网站信息量很大,但互动性不强;中文网页充斥了党派意识形态,而英文版则显得“新鲜”和“现代”。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民主化研究所主任 Peter Ferdinand 通过分析中文网络论坛——强国论坛上的信息内容,探讨了中国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他发现强国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可分为四类:腐败、小康社会和收入不平等,三个代表理论和私营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在对比了这些讨论与《人民日报》的官方报道之后,Ferdinand 教授认为,强国论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治参与的作用,展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电子社会资本和公共空间的雏形。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 Peter Yuen 对互联网将终结国家认同并带来一个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公民社会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对香港和大陆互联网文本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削弱了民族国家但并没有削弱民族认

同感,互联网使得新的跨国界的意识形态能够诉求于全球范围的受众,从而开启一个较少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新时代。

特别专题:中国的 SARS、手机短信和互联网

大会召开期间,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 SARS 疫情,因此特就“中国的 SARS、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举行了一次专题午餐讨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虽未到会,但会上播放了他的讲话录音。李教授认为媒体是这次萨斯灾难中的赢家,媒体的压力最终导致了中国政府向公众和世界开放萨斯信息。中国政府曾一再坚持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立场,并且欢迎旅客观光,但医生、病人家属邻居和媒体曝光了这种“压制”。卫生部一开始只是临时性地举行发布会,而且不提供任何可靠信息。随着1200多万条跟萨斯有关的手机短信的发送,政府开始同媒体合作,定期举行发布会,更新萨斯感染的数目,以维护其形象。邱林川归纳了萨斯危机的三部曲:谣言、否认和承认,表现了新旧媒体在推动政府承认萨斯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上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会代表就各个专题的发言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和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所有论文将以中、英两种语言结集出版。下一届“中国和互联网”国际学术研讨会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承办。本次会议的相关网络资源请查阅网址:
<http://annenberg.usc.edu/china>

[责任编辑:王海]